

中东国家政教关系变化 对民主实践的影响（下）^{*}

王 林 聪

内容提要 制度分化的强弱与否是分析和判断政教关系状况的重要尺度。在中东伊斯兰国家，政教关系的变化表现为政教一体、政教合一、政教分离和事实上的政教分离等多种类型，它们对民主实践的作用各异。政教一体和政教合一对于民主的实践起到抑制作用，但是，不同国家在一定的制度分化前提下，又有进行有限民主试验的可能，诸如伊朗在教权主宰下（法基赫制）进行的民主探索。政教分离或事实上的政教分离为中东国家推行民主化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但是，世俗化并不等于直接导向民主化的坦途。在中东地区，世俗化与民主化是不同步的，二者之间通常还经历权威主义阶段。

关键词 政教一体 政教合一 政教分离 民主

作者简介 王林聪，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副研究员、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北京 100007）。

政教分离或事实上的政教分离 与民主化的关系

政教分离是指国家政治生活不受宗教势力的支配，政权合法性不借助于宗教途径或神授的方式。政教分离表现为国家政权与宗教分离，以及社会道德领域、公共生活秩序与宗教分离。

（一）政教分离的标志与层次

政教分离涉及社会的变化和宗教本身的变化。一方面，社会各领域逐渐摆脱宗教的羁绊，社会制度日益理性化；另一方面，宗教本身在职能上逐渐失去了公共性，变成为纯私人的事务。在这种情况下，教会组织和宗教派别不参与任何执政党派的角逐，不充当政府的工具；政府也不将权力扩及宗教事务，不支持任何一个教派的信仰和教义。政教分离通常是制度分化的结果。教会在整个社会中首先分化出来，成为一个建制实体。教会与政权分化的扩展，又导致教会与政权结盟的解体。帕森斯把社会的制度分化视为政教分离最根本的原因。他认为“原始社会和西方之外的其他许多文明社会在社会组织的宗教方面和世俗方面是没有显著差别的；在那些社会里，没有‘教会’这种分化的组织实体”。因此，政教分离有一个前提，即由于社会的制度分化所导致的一种自然分离。

政教分离过程亦即世俗化。杨灏城先生把世俗化的标志归纳为“三个分离”，即宗教与国家相分离、宗教与司法相分离、宗教与教育相分离，进而分析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分水岭主要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B类）“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主化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美国] 帕森斯著；梁向阳译：《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49页。

表现在“三个结合”还是“三个分离”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坚持“三个结合”，即国家与宗教结合，反对政教分离；法律与宗教结合，坚决要求实施伊斯兰教法，反对成文法；以民众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官方意识形态与宗教结合，反对有悖于伊斯兰教的世俗思想。政教分离涉及政治权力、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 3 个层面。在伊斯兰世界，随着现代化的逐步推进，宗教在政治权力层面的影响呈弱化趋势，但它在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层面仍保持着强劲的影响力。就后者而言，只有经历深刻的宗教改革的洗礼，人们才能真正摆脱非理性的束缚，树立理性的观念。目前，由于伊斯兰教没有教阶（主要指逊尼派）和教会制度，很难形成因社会的制度分化而导致政教的自然分离。于是，在伊斯兰世界，政教分离常常采取了另一种形式：或采取强制性分离（如土耳其），或通过压制和排挤宗教势力造成事实上的政教分离（如埃及），并力图通过成立诸如宗教事务局等专门机构来为政教关系划定不同的归属。尽管如此，伊斯兰教在公共社会生活与思想观念层面仍旧根深蒂固。

（二）土耳其：政教分离对民主实践的影响

土耳其从制度上宣布政教分离到废除哈里发经历了两个阶段：1922 年 11 月大国民议会决定将素丹制与哈里发制分开，继而根据选举制度废除世系的素丹制，建立共和。新宪法规定“主权无条件属于人民，行政制度应建立在人民亲身和有效地把握自己命运的这一原则之上”。最初，政府选举了原素丹瓦西戴丁的堂兄弟阿布迪尔迈吉德为新哈里发，其初衷是试图使哈里发成为联系全世界穆斯林的精神象征。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哈里发只被授予了象征宗教权威的“先知的斗篷”，而被剥夺了象征世俗权力的宝剑。但是，传统上哈里发就职须取得全体穆斯林的认同，而新任土耳其哈里发仅得到土耳其穆斯林的承认，不具有代表性。新任哈里发不甘于作为象征性精神领袖。这才有了 1924 年 3 月的废哈里发制之举。凯末尔在新一届国民议会演说中强调，要保障共和国的安全和稳定，建立统一的国民教育制度，以及必须“把伊斯兰信仰从数世纪以来惯于充任统治工具的地位中拯救出来，使其得到纯洁和提高”。对于废除哈里发制，凯末尔称：“先知的诫命是让世界各民族皈依伊斯兰教，他并没有命令要为这些民族提供一个政府职能，也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哈里发制度意味着政府和行政的管理职能，一个真正扮演这种角色的哈里发怎样管理所有的穆斯林国家？”他还从历史的角度指出：“哈里发制度并无经典依据，真主从未诫命建立这类国家制度，这纯粹是教法学家们为了统治穆斯林大众所创立的一种功利主义的行政制度；同时，历史上真正的哈里发制度仅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持续了 30 年，其后的哈里发制度徒具虚名，完全是靠强权和暴力来维持；既然哈里发制度背离了初衷，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最适宜的国家政府的形式。”土耳其官方文件则强调，大国民议会是根据《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所肯定的“协商原则”废除哈里发的。

在推行世俗化过程中，凯末尔还强调世俗化不是反对伊斯兰教。他说：“宗教是必要的机构，一个民族没有宗教就不可能继续存在”，但是，“宗教必须同哈里发分开。前者是有用的，后者是不必要的……穆斯林世界过去没有哈里发照样前进，今后仍将前进”，必须反对“利用宗教攫取物质利益的卑鄙小人”。在实行政教分离时，考虑到伊斯兰教没有教会组织的特点，为避免因此而造成伊斯兰教的存在失去“依托”，新政权专门成立了指导和管理宗教活动的机构——宗教事务局。从处理政教关系上看，这一设置可以说是一个创举。

废除哈里发制虽然在伊斯兰世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但是，并没有引起土耳其社会的大动荡。相反，土耳其基本上保持了平稳状态。首先，基于当时是国际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浪潮的涌起，民族主义成为土耳其救亡图存的思想利器。民族主义是一种世俗性质的意识形态。在民族独

参见杨灏城、朱克柔主编：《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世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 4~22 页。

Hamid Enayat *Muslim Islamic Politic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ustin 1982 p 53.

[英国]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 276 页。

Hamid Enayat op. cit, pp 53~54 56.

转引自杨灏城、朱克柔主编：前引书，第 193~194 页。

立运动中，强调和捍卫民族利益成为土耳其最重要的任务。其次，奥斯曼帝国在战争中的崩溃，以及帝国素丹和哈里发频频向西方列强出卖国家与民族利益的行径，尤其是签署《色弗尔条约》，这导致素丹的统治威信扫地，动摇其存在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这是土耳其人民在革命后能够接受废除素丹制和哈里发制这一事实的重要原因。再次，凯末尔的卓越才能和显赫战绩，以及领导土耳其军民打击外来侵略取得了彻底胜利，不仅为他增添了个人魅力和威望，也为以后推行现代化实践奠定了基础。另外，从民族运动角度看，土耳其革命的胜利在当时的落后国家里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成为其他各国求存图强、竞相效仿的榜样，土耳其人民更是怀着胜利的自豪感进行现代化的探索，对新的实验和追赶西方现代化满怀憧憬与期待。于是，以现代化和世俗化为目的的探索之路在土耳其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也没有激起人们强烈的反抗。

政教分离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土耳其世俗化和现代化的推行为民主化奠定了基础，也创造了前提条件。这表现在通过建立和完善世俗法律体系、世俗教育体系，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世俗政权；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社会风俗的进步。土耳其作为落后国家最早进行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实验，并取得了成功。但是，从世俗化到民主化还有一个过程。世俗化并不等于民主化。就土耳其情况来看，从世俗化到民主化经历了一个权威主义的过渡阶段。世俗化与民主化是不同步的，世俗化并不能直接通向民主化。土耳其民主化的真正开启是实行两党制。1945年11月伊诺努总统在国民议会上称，土耳其民主的主要缺陷是缺少一个反对党，并宣布即将进行公开、自由和直接的选举。1950年大选，成立仅4年的民主党通过公平竞选以绝对多数票获胜并上台执政。民主党与共和人民党通过竞争性选举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替，这意味着作为民主政权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竞争性选举）已开始为人们所接受。在以后的民主化进程中，政权更迭虽经曲折反复，但这一规则没有动摇。由此看来，世俗化为民主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推行民主化是世俗化的必然步骤。但是，土耳其民主化在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产生了一种副作用——政教关系复杂化。土耳其的民主化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为巩固和加强世俗化发挥应有作用。相反，与民主化过程相伴随的是宗教势力的重新崛起。宗教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力越来越强烈，对世俗主义道路和建立在世俗基础上的民主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在一党制权威政权时期，对宗教的限制和压制毕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教关系问题，但是，在多党制民主政权里，如何规范宗教活动的领域，以及宗教应起什么作用是极为关键的难题。从战后初期开始，围绕着恢复宗教教育的一场大辩论使一度受压制的宗教信仰得到某种程度的复兴。政府先后在小学、中学恢复宗教教育课程，恢复伊斯兰教高等教育，并在首都安卡拉创建几所附属于大学的伊斯兰学院。与此同时，宗教活动日益活跃，教团组织如提加尼教团再度活跃，制造事端和骚乱。民主党上台后，所实行的政策虽没有偏离世俗主义的原则，却出现了一种在世俗框架下对宗教的让步或妥协，在客观上推动了伊斯兰教的复兴。甚至在与共和人民党的对抗中，民主党不自觉地利用了人们的宗教感情。伊诺努曾批评民主党为政治目的利用宗教。他在1955年共和人民党会议上指出，选举期间最不满的是那种为政治目的而利用宗教的现象。新、旧法律都禁止这种做法。然而，可悲的是宗教被广泛地、不公正地、野蛮地用来对待没有得到法律保障的人民党。

政教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代表宗教保守派和安纳托利亚商业资产阶级的救国党的兴起与参政。该党反对世俗主义，主张建立一个以“沙里亚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1974年共和人民党联合救国党组阁，标志着土耳其伊斯兰政党政治发展中的一个分水岭，出现了宗教向政治化方向发展

See Erik J. Zü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I. B. Tauris & Co Ltd, 1998, p. 221.

See *ibid.* p. 227.

See Mehmet Yasar Geyikdagı *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 New York, 1984, pp. 79–81.

See David Shankland, *Islam and Society in Turkey*, The Eothen Press, 1999, p. 89.

的倾向。这是自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获准参政、议政的伊斯兰政党，为宗教政党的合法化存在开了一个先例。在以后的政治舞台上，救国党多次在不同的联合政府中出现，成为政治天平上的一个重要砝码。更为突出的是，在 2002 年 11 月土耳其大选中，具有伊斯兰性质的正义与发展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赢得了 34.28% 选票，取得了 550 个国会议席中的 363 席），成为第一大党并单独组阁。目前，正义与发展党采取温和的政策，重申坚持国家世俗化方向，谨慎处理与军方的关系。该党把自己界定为保守的民主政党，不仅接受世俗主义，而且将宗教视为私人事务。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的变化比较明显。但是，人们对该党的伊斯兰倾向将给未来发展带来什么影响仍心存疑虑。

土耳其伊斯兰政党从兴起到单独上台执政，历时 30 余年，在土耳其民主实践中注入了越来越多的宗教因素，土耳其社会宗教的政治化倾向和政治的宗教色彩尤为明显。截至目前，各届政府在政教关系上仍坚持国家发展道路的世俗主义根基，遵守宪法。土耳其现行宪法（1982 年颁布）强调政教分离的原则，“绝对不许以神圣的宗教信条干预国家事务和政治的原则”，“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非宗教的、社会的法治国家”，“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把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或法律基本制度建立在——即使部分地建立在宗教信条的基础上，或谋取政治利益和个人影响等目的，利用或滥用宗教感情……”但是，各届政府不断向宗教势力的妥协，实际上为宗教势力的复兴和问鼎政权创造了机会。从世俗化到民主化，土耳其政府在处理政教关系方面有深刻的教训：首先，采取强制性世俗化政策，尽管在当时没有引起整个社会的剧烈震荡，但是，对宗教采取简单的压服办法终究不是解决政教关系的有效途径，也必然导致对宗教改革的疏忽。面临史无前例的艰巨的现代化建设任务，使民族主义的政权更容易忽视在这样一个传统国度里认识宗教的社会功能。由于世俗化的不平衡，各届政府对广大农村中影响巨大的伊斯兰教团缺乏长远的改革构想，以致教团长期以来是反对世俗化最激烈的阵营。其次，实行民主化以来政教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党派斗争中利用宗教的倾向不断加剧，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在政治斗争中不同程度地利用宗教来争取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在政府的经济政策失败或遇到挫折时，常常求助于宗教或宗教力量；在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里，长期将宗教作为抵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武器和工具。这些做法助长了宗教势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再次，民主化进程在客观上为宗教势力的崛起提供了便利，而政府的政策失误、经济困境、失业等社会问题就成为世俗化受到攻击的把柄。于是，在要求民主和宽容的名义下，以民间的半合法的教团、伊斯兰教政党和伊斯兰教极端秘密组织 3 种势力，对国家政权的世俗化方向形成了冲击。在经历近一个世纪的现代化运动后，土耳其的变化巨大，但是，“土耳其生活和文化的最深远的伊斯兰老根却仍然活着，作为土耳其的土耳其人和穆斯林的这项标记仍然是不可动摇的，伊斯兰教经过一段时期后再度转为旺盛……”可见，世俗化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世俗民主政体的建立，必须以世俗化为前提，而世俗化的关键则在于对宗教的改革上，这是土耳其巩固民主政体的必然步骤。

（三）埃及：事实上的政教分离及其对民主实践的影响

19 世纪初是埃及政教关系变化的一个分水岭。穆罕默德·阿里通过依靠以奥马尔·麦克莱姆为代表的部分爱资哈尔长者们（宗教人士代表）的支持，抵抗英国的入侵，扫除曼姆鲁克势力，最终登上了最高权力宝座。然而，一俟他站稳脚跟，这种短暂联盟旋即破裂。为强化中央集权，穆罕默德·阿里先后颁布法令，没收大批宗教田产，分化、瓦解宗教上层集团，并将奥马尔·麦克莱姆逐出埃及。随着大批宗教田产被没收，长期支撑宗教长老们的经济基础动摇了，宗教长老作为埃及政治舞台上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从此一蹶不振，不得不依附于统治当局，变成阿里王朝统治人民的工具。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006 p. 1164.

See Meliha Benli Altunisk "The Turkish Model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rab Studies Quarterly*, No. 1-2 Winter / Spring 2005 p. 50.

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 479、481~482 页。

[英国] 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前引书，第 447 页。

然而，政教关系的变化在埃及有其复杂性的一面。如果说宗教上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式微的话，那么，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仍然非常强大。阿里王朝的统治者不仅利用宗教人士对政权的合法性进行“包装”，而且把伊斯兰教作为他们维护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官方意识形态。1923年宪法中还明确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埃及社会世俗化步伐明显加快，但是，伊斯兰教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基于这一现实，埃及政府从未公开宣布实行政教分离政策，却又不允许宗教力量介入政治事务，形成了所谓事实上的政教分离。

这种政教关系态势一直延续至今，它意味着在埃及仅实现了政教分离的第一步，即宗教与国家政权相分离，尚未实现宗教与社会生活的分离，伊斯兰教并未完全变为私人的事务。更重要的是，人们对政教关系还有很大分歧。例如，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埃及社会就围绕着政教关系展开了一场论争。主张政教分离的代表人物是爱资哈尔大学著名学者阿里·阿卜杜·拉齐克（Ali Abd ar-Raziq）。他曾在土耳其宣布废除哈里发制时就出版了《伊斯兰教与政府的基础》（1925年），论述了哈里发制度无论从《古兰经》、圣训，还是“公议”中都不能证明该制度存在的理由，而历史上的哈里发制度一直是依靠武力的方式建立和维持的。因此，他认为政治权威和政府尽管对实现伊斯兰教的理想至关重要，但它们不属于伊斯兰教的本质；按照对伊斯兰教的正确理解，穆斯林有权自由选择能确保自身福利的政府。但是，该主张当即遭到保守派宗教学者的严厉谴责。后者对当时凯末尔废除哈里发制痛心疾首，宣布废除令无效，并试图召集各国穆斯林代表大会，选举新的哈里发。爱资哈尔大学校长和埃及穆夫提共同署名、并以“埃及王国伊斯兰教总会”名义发表的一项宣言，甚至对土耳其政府废除费兹帽等服饰改革大加抨击。在激烈争论的背后，也折射出当时对于敏感的宗教话题已有较宽松的社会氛围，不啻为一大进步。1936年，政府颁布法令，宣布爱资哈尔清真寺和爱资哈尔大学分离。爱资哈尔是埃及最著名的清真寺和伊斯兰研究机构。爱资哈尔教长被公认为全国最高宗教领袖，具有发布“法特瓦”的权力，对有争执的问题拥有最后裁判权。爱资哈尔清真寺与爱资哈尔大学的分离，反映出埃及社会在世俗化方面所取得的新进展。

1952年革命后，在政教关系上，爱资哈尔教长和穆夫提（教法最高说明官）均由总统任命，从而使教权受政权所支配，爱资哈尔教长和穆夫提竭力在政治上同政府保持一致，政府则通过成立宗教基金部管理宗教事务。与此同时，纳赛尔时期，强调埃及的“阿拉伯—伊斯兰”政治文化属性，倡导阿拉伯民族主义，以“宗教属于安拉，祖国属于大家”来激发人们对国家的忠诚，并对诸如穆斯林兄弟会等社会宗教组织予以坚决镇压和取缔，不允许宗教介入国家政治生活。纳赛尔是根据现实需要而不是宗教经典来指导行动的。在他的“三个圈子”理论中，“阿拉伯圈子”是首位和最重要的；“非洲圈子”次之；“伊斯兰圈子”则排在了最后。可以说，宗教因素在纳赛尔主义思想体系中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萨达特总统当政后，有意通过提高伊斯兰教的地位来增强其政权的合法性。1971年9月颁布的永久性宪法，首次规定“伊斯兰教法原则是立法的主要来源之一。”1980年又将此条修改为伊斯兰教法原则是立法的“主要来源”。萨达特总统还赋予爱资哈尔清真寺对埃及各大学进行宗教指导权。又在《政党法》中规定各政党的宗旨、纲领、政策和活动方式不得有悖于伊斯兰教法；但政党不得建立在种族、血统、宗教、信仰的基础上。爱资哈尔教长则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为政府服务。例如，1977年萨达特访问以色列，爱资哈尔大教长阿卜德·哈利姆·马哈茂德拍发了第一份支持电。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和约后，爱资哈尔宗教学者裁定此和约“符合伊斯兰教的决断”。这些不仅为萨达特的政策增添了合法性，也有利于遏制宗教极端势力的破坏活动。但是，萨达特时代对

See Hamid Enayat op. cit., pp. 62-64.

1919年反英起义时的一个口号，它强调埃及的科普特人（信奉基督教）和穆斯林应当团结起来，摒弃宗教纷争，共同反对英国殖民当局的统治。

Derek Hopwood, *Egypt Politics and Society 1945-1984*, London 1985 p. 119.

伊斯兰教，以及伊斯兰主义组织所采取的是既利用又限制的态度，最终导致政教关系紧张。他的代表性话语——“宗教中无政治，政治中无宗教”，道出了不允许宗教势力插手于政权的真实意图。

但是，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中东地区的迅速蔓延，有关宗教话题的讨论在埃及变得格外敏感。先后发生了多起因发表对宗教不同见解遭受不幸的案件。例如 1992 年著名世俗主义作家法尔吉·富戴被暗杀、1995 年开罗大学副教授纳斯尔·阿布·宰德被宣判为叛教者，等等，埃及社会的宗教氛围颇为压抑。于是，穆巴拉克总统执政以来，在处理政教关系上比较谨慎。一方面，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奉行事实上的政教分离政策，他还多次表示，反对混淆宗教与政治，绝不允许利用宗教传播极端主义并制造冲突；重申“宗教属于安拉，祖国属于大家”，强调不同信仰的科普特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另一方面，加强对宗教的引导。近年来，赋予爱资哈尔伊斯兰研究所知名学者以司法约束权，他们有权下令没收和禁止有悖于伊斯兰教教法及其准则与价值观的印刷品、录音带和演说等。另外，他们将所有民办清真寺并入宗教基金事务部，该基金部还与爱资哈尔清真寺协调制定宣教计划和纲领，研究对付极端主义思想的种种策略。

纵观埃及一个世纪以来的变化，世俗化在缓慢中前行，政权层面上的政教分离已是既成事实，但是，在公共生活和观念意识方面，伊斯兰教的影响力仍然很大。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的权威政权主导下的民主实验，实行多党制和民主选举，开放了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但在宗教话题上的自由度却大幅下降。同时，作为半合法身份的最大反对派力量——穆斯林兄弟会正在借助选举等合法渠道积聚力量和扩大影响，并在 2005 年人民议会选举时一举夺得 88 个席位，而有合法身份的反对党仅获得 9 席。埃及《金字塔报》专栏作家艾哈迈德·萨拉玛说：“埃及没有真正的反对党，唯一的压力就是穆斯林兄弟会。如果开启了民主之门，他们就很可能上台执政。”显然，埃及民主化进程中伴随着伊斯兰主义势力的抬头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它对未来政教关系的变化仍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结 语

中东国家政教关系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是中东国家历史运动与发展的产物，而且影响并决定着不同时期政权运作的基本格局，形成了诸如政教一体、政教合一、政教分离，以及事实上的政教分离等不同类型的政教关系。每种类型的政教关系都有其特定的内涵，对民主实践的影响也有所不同。作为伊斯兰政教关系史上的主要形式——政教一体和政教合一，它们对民主的实践一直起着抑制作用。但在一定的制度分化前提下，又存在着民主实践的可能，如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行的教权主导下的“伊斯兰民主”。作为政教分离或事实上的政教分离类型，它们为推行民主化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但这并不等于能直接通向民主化，从土耳其、埃及等国的发展道路看，从世俗化到民主化一般都经历了权威主义阶段。中东国家政教关系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该地区探索民主化道路的艰巨性与长期性。从更广阔的背景看，它揭示了中东国家政教关系的变革尚处于初步阶段，深层次的变革还有待推进。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伊斯兰教本身的发展也会与时俱进。因此，如何为该地区的政治发展和民主实践创造较为有利的条件，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取决于中东国家政教关系能否真正理顺——给宗教活动一个明确而又可以被接受的界限。有鉴于此，在中东国家世俗化和民主化进程中，对宗教的改革乃是至关重要的历史性课题。

（责任编辑：徐 拓 责任校对：贾丽华）

G. H. Jansen, *Militant Islam*, London 1979. p. 141.

Shaden Shehab, "Mixed Messages", *Al-Ahram Weekly*, 17-23 November 2005.

What Course to Follow for Islamism? (2 of 2)

Dongfang Xiaojiao

pp 29– 35

After September 11, the United States launched a War against Terrorism, and overthrew two legal Islamic governments afterwards. Nevertheless, The United States pushed forward the democratic reform in Moslem world, so as to eliminate the growing soil to produce the Islamic extremists. People usually try to avoid to connect the anti- terrorism war to the conflicts between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But in fact, A cident September 11 and Anti- Terrorism have made

such kinds of topics like American and Moslem, Christian and Islam more attracting. The goal of this paper tries to describe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mporary Islamism through their changes and developments,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s my research on this issue before, my study here has three latitudes basics: the relation between Islam and west world, the changes in Islam societies, and the internal causes inside the Islam.

Change of Political- Religious Relation and Its Effect on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 (2 of 2)

Wang Lincong

pp 36– 41

The extent of strong and weak of the systematic division is an important standard to judge the situation of political- religious relation. The characters of the political- religious rel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expressed such kinds of types: integrating politics and religion, combining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to one, separating politics and religion, and de facto dividing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and they have different impacts on democracy. The two former can restrain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But in some

countries like Iran, some limited democracy practices can also be allowed under these two kinds of political- religious relations. The phenomenon of de facto dividing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has made that it is possible to conduct democracy test in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It doesn't mean that securitization can lead directly to democrat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the securit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didn't occur together. Generally, there is a stage of authoritarianism from securitization to democratization.

Turks' Expansion and the Rise of Uthman Empire After Islamization

Jiang Mingxin

pp 42– 48

The rise of Islam gave a history opportunity to Turks' expansion towards the west areas. There were many reasons for the arising of Turks Empire. One of the key factors was the consistent policy of social mobilization. This social mobilization included the mobilization of religious belief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material encourage for people. The success of Turks' social mobilization was due to their religious belief and its vulgarization. The Timar system, the Koran system and the Royal Guard system, these

important characters of Turks Empire, were the necessary systemic means of belief mobilization, and also the means to connect the spiritual belief and material needs for believers. These means provided the stronger motivation, objective and spiritual power for the believers, which were necessary realistic basis to connect their spiritual world to material world, so that the rising and the prosperity of Turks Empire had its substantial base.